



文/片 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
首席记者 郭春雨

记者 王开智 王尚磊

保护郭振

时隔24年，郭刚堂见到了儿子郭振。郭振已26岁了。他不记得2岁以前的事，从没想过自己曾是被拐儿童。郭刚堂仔细地从儿子身上寻找着血缘的印记，“一看就是我儿子，但比我帅多了。”

在公安机关举行的认亲仪式上，头发花白的郭刚堂，一只手紧紧抱住比自己高出半个头的郭振，一只手去抹眼泪。

但在众多镜头簇拥下，郭振的背明显僵直着，他不知道手应该放在哪里——眼前的父亲，如此陌生。在后续采访中，郭刚堂澄清说郭振不是没哭，当时他正在低声安抚自己，“爸妈，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”只是当时话筒收声不好，众人没听见这一句。

按照相关规定，被拐儿童成年后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，郭振选择回到自己的养父母家。他已经读完大学，当了老师，即便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，也难以割舍早已熟悉的一切。

郭刚堂说，孩子找到后，自己也有倾诉的欲望，想要敲锣打鼓地告诉全世界，孩子找到了。但平静下来后，想得更多的是，到底哪种方式才是真正对孩子好——郭振和养父母之间有24年的情感牵绊，这既无法否认，也不能抹去。“郭振选择重新回到养父母身边”，消息一出，舆论瞬间引爆。很多人都希望郭振能回到亲生父母身边，因为父母找了他24年。尤其是父亲郭刚堂，为寻子单骑走天涯，几经生死。

“我支持郭振的选择。”面对沸腾的舆论，郭刚堂说，如果自己非要逼着孩子做选择，那受伤害的就是孩子，“就算孩子选择我们，也会有人说他不报恩。”

作为父亲，郭刚堂在用自己的一切力量去保护郭振，不让他陷入两难境地，“整个事情最大的受害者是孩子，如果非要他来到我身边，他会受到二次伤害。”

为保护郭振，在公开表达了对郭振选择的支持，并且表示同郭振养父母“像亲戚一样走动”后，郭刚堂“消失”了。他几乎不在公开场合露面，小心保护着郭振的一切信息，包括照片、工作单位乃至他养父母的家庭信息等，他用沉默，等待热度的消失。

父与子

郭刚堂在重新学习做一位父亲。除了郭振，他还有两个孩子，虽然常年奔波在外，但父亲给孩子的爱从来没有缺席。每次回来，郭刚堂都会给两个孩子讲点外面的新鲜事。在两个孩子心里，爸爸去外面找哥哥了，但爸爸会回来，给他们带来礼物和故事，爸爸是很厉害的人。

但是给郭振做父亲，郭刚堂显得有些小心翼翼，像一个初为人父的新手爸爸一样，探索着和儿子的相处方式。

郭振是一名教师，郭刚堂平时几乎不会给他主动打电话，只是从微信上联系。父子之间形成了默契，他们在聊天中会刻意跳过中间那些年。

为了找到郭振，郭刚堂在外面乞讨、挨打，吃遍人世千般苦，他从来不说；郭振的成长经历，他在另一个家庭里遇到什么，成长的困惑如何消解，郭刚堂也从来不问。双方聊天，都在小心翼翼地避开敏感话题。“这一个月以来，我们基本都是聊新闻，聊工作，我们谈以后，不谈过去。”

郭振找回来了，郭刚堂不想让那些记忆碎片变成玻璃碴扎在孩子心上，他不想让孩子背上

总有那一天会走进彼此我心里

《失孤》原型郭刚堂讲述找回儿子一个多月的心路历程

道德枷锁。

半个呱嗒

很多人对郭刚堂如此“大度”的选择并不认同，一路见证了郭刚堂经历的痛苦，亲戚朋友都劝他把孩子要回来。采访时，小区里一位大爷远远地就向郭刚堂招手：“你得把孩子带回来啊！这是咱自己的孩子……”

郭刚堂的妻子张文革总是想着能多看看郭振，想跟孩子生活在一起。说起这个问题，郭刚堂沉默了一下，“那她也得忍着。”他怕郭振会有压力。在采访时，他小心地避开记者询问的一切有关郭振的细节，“我不想打破现在的平衡。”谈及认亲后的走动，郭刚堂并没有正面回答，只是表示近日河南洪灾和疫情的原因，让两地往来不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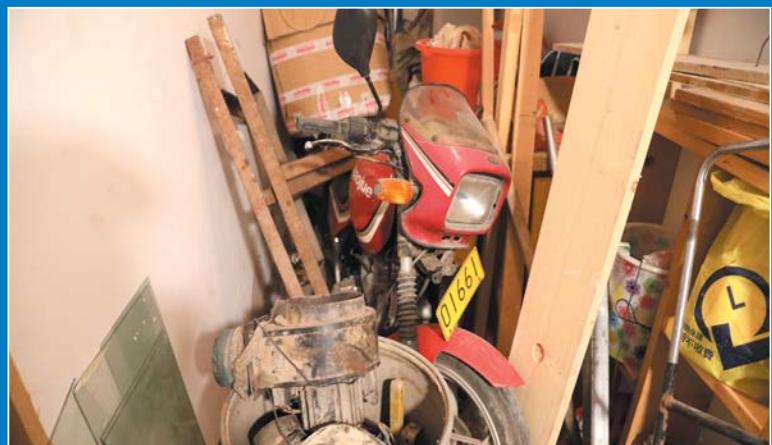
“孩子在哪里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心在一起。”郭刚堂心里清楚，24年的分别，让双方不可能没有一点隔阂，“日久见人心，总有一天会走到心里去。”只是，就算每个人都在努力愈合创口，缺失的24年还是横亘在这个家庭中间，像一道隐秘的伤痕。郭振生活在河南，爱吃面，郭刚堂家在山东聊城。虽然都是北方，但聊城是运河古都，和中原大地的口味、菜品相差甚远。认亲当天宴席上有一盘聊城的名吃呱嗒，这是一种煎炸的当地小吃，郭振当时吃了半块。这个细节，让郭刚堂高兴了很久，“这是家乡的味道。”

“你怨恨吗？”

一个多月前，郭刚堂找到被拐卖24年的儿子郭振(又名郭新振)。在此之前，他从来没放弃对孩子的寻找。数十个省份，骑行50多公里，报废10辆摩托车……以郭刚堂的故事为原型拍成的电影《失孤》，由刘德华主演。然而《失孤》的故事并未迎来如大众期待的完美结局，已经成年的郭振选择继续和养父母一起生活。对于郭振的选择，郭刚堂说他理解并支持，“我唯一的想法，就是孩子能好。”



找到儿子，郭刚堂的心终于放松了。



郭刚堂寻子骑的摩托车已经用不上了。

郭刚堂当年寻子用的摩托车，静静躺在地下室里，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——这是郭刚堂骑的第十辆。寻子时，郭刚堂就把印着孩子照片的旗插在摩托车后面，行程逾50万公里，走遍了除新疆和西藏外的所有省份。电影里，刘德华说，“15年了，只有在路上，我才感觉自己是个父亲。”这基本是郭刚堂对导演彭三源说的原话。

路上的艰辛，只有郭刚堂自己能体会。他遇到过交通事故摔断过肋骨，碰到过拦路抢劫，还遭遇过泥石流。在骑行深圳的路上，一万五千多公里行程中，见到100多起车祸，12个人在他眼前死掉，其中6个是骑摩托车的，“老天没让我死在路上，已经算对我不薄”。

儿子走失前，郭刚堂在当地算殷实之家。为了找儿子，不到一个月就倾家荡产。郭刚堂寻子路上的开销，靠沿途出售家乡的手工葫芦为生。没钱了，就回家打短工，打完工再上路。最窘困的时候，他手里只有一毛五分钱，只能要饭吃。为省钱，他住过墓地，睡过桥洞，和流浪汉抢睡觉的地方。

有一次，郭刚堂骑到大别山，正好碰到大风大雨，山路一侧就是悬崖，郭刚堂连人带车卡在了水泥桩上，看着一侧悬崖，郭刚堂觉得跳下去把一切了结也挺好，但这时候，摩托车后座上的旗子还在风雨里飘着，发出啪啪的声响。那声响像郭振在说，“爸爸别难过，我一直陪着你呢。”九死一生，这只是漫漫寻子路上的一个瞬间。

“你怨恨人贩子吗？”记者问。家庭破碎、风雨奔波、双鬓霜，24年的亲情是一片空白。

急不得

郭刚堂尽最大可能给孩子自由和选择，但他有时候也不是那么“大方”，会在某些细节上坚持：他始终坚持叫孩子“郭振”，虽然孩子对这个名字并不熟悉。

一个月的时间里，郭刚堂基本知道了孩子爱吃什么，喜欢什么，郭振也开始慢慢了解着亲生父母，这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。父子之间，在互相打量、试探中，慢慢感受和靠近对方。郭刚堂说，这个过程，“急不得”。

能够做到“急不得”，一方面是24年的时间已经磨平了郭刚堂的一切棱角，另一方面，在找孩子过程中，他见过太多眼泪和破碎。某种意义上，寻亲这件事更像在和命运赌博，成功找到孩子已经不容易了，能回归家庭更难。

在找孩子过程中，郭刚堂主办了天涯寻亲志愿者协会，在找郭振的同时，也为更多人找丢失的孩子。他见到太多不尽如人意的案例：有对夫妇丢失孩子后，十多年遍寻无果，丈夫顶不住压力，跳楼死了，结果孩子在30多岁时找回了；有的夫妻因为找孩子的事产生分歧无奈离异，两个人的压力留给一个人继续去找……

从某种程度上说，郭刚堂算“幸运”的：重新见面时，郭振健康，读过大学，是个彬彬有礼的

好小伙。“人得往前看。”地下室里，还散落着一些寻子时用的孩子照片，郭刚堂把这些收拾起来，关掉灯，锁上门，“没有任何隔阂是一种奢望，相处需要时间，我们都在努力。”

关机的自由

记者见到郭刚堂那天，他穿了一件浅蓝色衬衣，西服裤子，还有一双簇新的皮鞋。这是他跟妻子张文革一起去镇上服装店买的，“挺大的服装店，这身加起来得300多块钱。”在此之前，他已经很多年没买过、穿过这么“正正经经”的新衣服。

孩子妈妈张文革也变了，她一直饱受肩疼困扰，但从来不舍得去医院看，怕花钱。这次她主动提出要去医院看病，“以后儿子成了家，得看孙子孙女。”郭刚堂带着她，医生给扎了几针，原本疼得抬不起来的胳膊很快觉得好转，“就花了167块钱。为了这点钱，她就这么忍着，疼了这么多年。”说起这个，郭刚堂觉得愧对妻子，为了找孩子，夫妻俩这么多年一直过着近乎自虐式的生活。现在儿子找到了，妻子终于肯给自己花钱了。夫妻俩之间的聊天也变了。以前郭刚堂寻子无果回家后，两人纵有千言万语，也被大段沉默代替。因为不管说什么话题，最终都会引到郭振身上。郭振的丢失是两人最大的痛。

“现在我们俩遛弯，能聊点别的了。就算又说到了郭振，也没那么沉重了。”郭刚堂说，终于可以卸下包袱，聊点家长里短了。

寻回郭振后，郭刚堂终于有了“关机的自由”。以前怕漏掉线索，电话从来不敢关机，但随着自己“出名”，每天都会接到各种电话：除了让他帮忙找孩子，还有让他找牛、打官司、倾诉的。郭刚堂现在终于可以关机了，“这是找回郭振后我觉得最幸福的事。”

新的生活正在规划中。郭刚堂喜欢开车，他脑子挺活，已经看好了一个运输项目，准备开干，“任务很艰巨，还得给儿子娶媳妇、看孩子呢。”因为刘德华主演的《失孤》引起轰动，之前有多家直播公司找到郭刚堂，想“包装他当网红”，价格从40多万一路开到近200万，都被郭刚堂拒绝了，“男人要靠自己的双手养家糊口，不弄那些东西。”

停不下来

郭刚堂说，他太懂孩子丢失的痛了。自己的孩子找到了，还有很多孩子没找到，他不忍心停下。

“我这几年一直在找人开发一个寻亲程序，就是把所有失踪人口的信息尤其是特征都放上去，只要用人像、关键词对比，就能找出相关的人。”郭刚堂掏出手机，给记者演示上面的信息，打开小程序“天涯寻亲”，输入“伤疤”关键词，包括郭振2岁照片在内，出现在失踪儿童一栏。

“一个老郭能有多大力量，就是累死，我也没有多大本事，我就是个普通人。”郭刚堂说，现在在他的微信、抖音每天还收到大量信息，根本看不过来，“等这个软件上线，大家就能通过这个找到很多关键线索和信息。”

郭刚堂说，这个程序的种种功能，针对的都是自己寻子几十年的痛点。他计划着，等疫情形势缓和一点，自己就去北京再找一趟技术公司，把这个软件完善后正式推出。等一切都步入正轨，自己就从天涯寻亲协会会长的位子上退出，把这个寻亲软件捐出去，让相关部门来接管运营。

“到时候，老郭也过过正常的日子。”郭刚堂计划了三件事：骑着摩托车玩，陪妻子旅游，帮儿子看孩子，“以后就过这样的好日子。”